

先锋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 ——梁漱溟如何走上乡村建设道路述论

察应坤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逻辑出发点是其对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思考。社会主义、佛学、儒学都是其思想的资源。北大教书, 曹州、广州办学, 北京“亲师取友同处共学”, 广东办理乡治, 山西村治考察等为其乡村建设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参照, 主编《村治月刊》, 任职河南村治学院、主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使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得以实现, 也凸显出两者巨大的张力。他对社会运动存在的“与政府应分而不分”“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彼此亦不能合而为一”有了深刻认识。尽管如此, 梁漱溟对“中国老道理的真精神里开出一个新局面”仍然抱着一个乐观的认识。

【关键词】梁漱溟; 乡村建设; 王鸿一; 邹平实验县; 村学乡学

【中图分类号】S-09; 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4-0113-12

Pioneering Theory and Compromising in Practice: A Discussion on How Liang Shuming Embarked on the Road of Rural Construction

CHA Yingkun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The logical basis of Liang Shuming's theory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is his reflection on problems existing in social and personal life. Socialism,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were academic resources for his theory. Some of Liang's social activities supplie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formation of his theory, like teaching in Peking University, running schools in Caozhou and Guangzhou, organizing study groups with teachers and friends in Beijing, promoting township to be organiz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vestigating Shanxi province's village organization and so on. While some of hi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like editing *Cun Zhi Monthly*, assuming duty at Village Organize Institute of Henan, supervis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Shandong, helped his theory to be further reconciled with the practice, it also revealed the huge tension between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Accordingly, Liang gained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and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peasants. Even so, Liang Shuming still holds an optimistic understanding of "opening up a new situation in the true spirit of China's old principles".

Key words: Liang Shuming; rural reconstruction; Wang Hongyi; experimental county of Zouping; village school and township school

对于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来说, 梁漱溟是不容置疑的理论大家,

[收稿日期] 2023-10-22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近代乡村建设模式比较研究”(23CLSJ06)

[作者简介] 察应坤(1979-), 男,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20世纪乡村建设运动。

不仅如此,他还做过邹平实验县的县长,亲身投入到乡村改造的洪流之中^①,因其理论上的独树一帜和实践上的坚持不懈,声名享誉政学两界,后以村治派领袖身份^②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旋以民盟(村治派^③)代表的头衔参加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在其时,政治地位极高。

1937年邹平乡村书店《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出版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形成的标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④,任何一个学者或者思想家的思考和主张都是随着所处时代形势和本身个人境遇变化而改变的,这些变化都是建立在自己已有思想和生活经历的基础之上。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形成并不能简单从他开始注意乡村问题来爬梳。

与任何一种理论都是闭环的恰恰相反,实践都是开放的。梁漱溟从自身成长所学所经历,特别是所从事的乡村建设事业中归纳提炼演绎出来的理论思考,往往和乡村建设事业实际发展的具体路径、呈现结果并不一致。理论与实践很多情况下还出现了悖论式的状态。本文试图从梁漱溟的具体社会行动中呈现这一状态,为进一步理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当时的社会变迁提供一条微观线索。^⑤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梁漱溟出生并成长于北京,从青少年时期起即保持着对于时代社会变迁的敏感。在其青少年时期亦有革命的意识,热心社会主义的主张。1911年,梁漱溟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后任职《民国报》编辑记者。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讲他在1912年时“曾一度热心社会主义,达于高潮。当时我亦作了一种《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我们组织所谓京津同盟会,亦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⑥,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说“力求民的势力之养成”^⑦,这些表述中都袒露出梁漱溟民主革命者的倾向。当时胡适之曾说“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要革命的”^⑧,梁漱溟深以为然:“做社会运动自是我的本色,大家实无所用其疑讶。”^⑨

① 相关研究中,贝淡宁、李东阳指出,梁漱溟则通过“理性之国”作为理解传统社会的依据,构建起“团体政治”映照下的民主尚贤观,最终决定了其社会本位的路向选择,见贝淡宁、李东阳:《钱穆与梁漱溟民主尚贤观之比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吴倩认为梁漱溟从政治制度与实践层面探索了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之道,见吴倩:《“伦理本位”与“乡约重建”——梁漱溟对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现代哲学》2023年第2期。李焯、刘祖云则认为,梁漱溟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认识,包含了“文化失调、制度失范与主体失能”三重归因机制,见李焯、刘祖云:《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回眸、反思与展望——以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22年第2期。

② 《由“放弃行动专事言论”至“保留言论专事行动”》,《天津真善美画报》1947年12月21日第1版。

③ 《介绍政协会代表:村治派代表》,《大刚报(汉口)》,1946年1月16日第3版。

④ 卢勇、冯培:《20世纪以来大运河水利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中国农史》2019年第5期。

⑤ 有专家指出:“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层面来把握梁漱溟究竟是如何走上乡村建设道路的。这一问题确实是值得深入讨论,因为它背后指向了自清末以降试图通过政治变革——从清末的宪政变革,到革命建国——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努力,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恰恰是在宪政与革命之外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的努力,这一转向是如何造成的,该问题的思考有助于理解在20世纪上半叶激进社会变革之外的非激进潮流。”因此有必要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角度进行深度挖掘。笔者非常赞同这一洞见,并已经按照此路径进行了相关学术论证,详见察应坤:《“村治派”对近代中国乡村出路的理论思考》,《史学月刊》2023年第10期;察应坤:《基层权力组织的再造——民国乡村建设实验的“菏泽模式”》,《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察应坤:《二十世纪前期知识人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以“村治派”中的吕振羽为中心》,《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察应坤、邵瑞:《王鸿一的“村本政治”思想及其对梁漱溟的影响》,《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⑥ 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村治》1930年第1卷第1期,第3-4页。

⑦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学艺》1917年第3卷(号),第262页。

⑧ 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村治》1930年第1卷第1期,第3页。

⑨ 同上。

这种早期革命功利主义的思想在政治追求毫无建树的情况下,逐渐消解。但他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对佛典著作的沉浸使得梁漱溟产生厌世思想,“根本否认人生”,迅疾折入佛学一路。几度出家,虽未成志,却为梁漱溟的理论建构奠定了思维和逻辑的根基。梁漱溟在1914年发表《谈佛》,1916年发表《究元决疑论》,1917年在北京大学任职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和佛教哲学,这些阅读、写作和讲习的锤炼,养成了梁漱溟“出于佛家思想”观察文化的方法^①。以《究元决疑论》来说,此文分为两个部分,一为“佛学如宝论”,探讨宇宙本体,一为“佛学方便论”,谈论现象问题,最后以“舍妄取真”的“出世间义”来循序渐进“随顺世间义”挽救众生,作为他“究元决疑”的路径^②。这一条路径标示出他今后的行世原则和思想的基础。

由人生问题的思考到社会问题的思考,是梁漱溟从佛学再转到儒学的动力。入北大教书后,一批著名学者如陈独秀、胡适等领衔推崇西方思想,梁漱溟对东方文化的未来发展倍感焦虑。对《论语》的研习,特别是孔子所言“乐以忘忧”“仁者不忧”把梁漱溟从“人生唯苦”的语境中解放出来,《明儒学案》东崖语录中“百虑交铄,血气靡宁”八个字促使梁漱溟默然醒悟,决定放弃出家之念,承担起为儒学正名、为中国文化复兴的大任。

由革命功利主义到醉心佛学再到儒学,这些思想不断累积、沉淀、交织、交锋、更新,成就了令他名声大噪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出炉。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世界文化的三路向说,即西洋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调和持中,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此说甫一问世,在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引起“广泛的兴趣”。在西方文化占主导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如何实现自身的主体化发展?梁氏主张以全盘西化的过渡而达到中国文艺复兴从而实现东方文化的翻身。

梁漱溟提出的问题虽然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未得到学界共鸣。相反,来自各界的批评却纷至沓来。东方文化派张君勱、张东荪、章士钊均指责梁漱溟一文为无根之说,特别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革新者、提倡人生佛教的著名高僧太虚更是从“人生观的科学”角度上对梁漱溟多次批评,认为:“梁漱溟……臆造出三种人生的三条路,谓此时当走儒家持中的一条路,欲推开了佛学,生吞了近代西洋化,让儒家出来独霸。这全是宋、明儒尊自民族、斥他民族的偏见。”^③

学界少有共鸣,却引起了一位地方实力派人物王鸿一的注意。梁漱溟北大讲演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给了当时处于实践有余、理论不足、思想困惑中的王鸿一很大的启发。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文化压力,如何为中国谋出路,如何为民众谋生活,如何保持民族精神本性?梁漱溟和王鸿一都有一种认同危机。1921年,梁漱溟临近而立之年,理想萦怀,北京大学的教职无法施展他心怀天下普济苍生的抱负。此时王鸿一邀请梁漱溟来山东创办曲阜大学,让梁漱溟颇为心动。1923年春天,梁漱溟到山东曹州做了实地考察,在曹州中学所做讲演中提出应该“农村立国”,但“不敢自信”^④。

创建曲阜大学存在的主要障碍就是缺少教职人才、办学宗旨难以统一。这种情况下,梁漱溟考虑在办大学之前先成立一学会,“今先组学会,一面固从事于学问的研究,一面并相勉于生活之合理,将来办学方得精神贯串”^⑤。梁漱溟提议在创办曲阜大学前,先以菏泽明清以来的重华书院为名,创办大学的预备学校,同时将其作为人才储备、师资预备的过渡机构。重华书院在研究项目上侧重于哲学(心理理论附此)、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三个方面,在征求人才方面,按照梁漱溟“亲师取友同处共学”的意向不拘一格延揽师资。跟随梁漱溟到曹州办学的有北大的陈亚三、黄艮庸,四川的王平叔、钟伯良、张俶知,北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6页。

② 关于此文内容参阅梁漱溟:《究元决疑论》,《东方杂志》1916年第13卷,第5期、第6期、第7期。

③ 太虚:《致吴稚晖先生书》,《海潮音》1928年2月第1期。

④ 梁漱溟:《漱溟卅后文录》,“槐坛讲演”,《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730页。

⑤ 梁漱溟:《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1页。

师大的徐名鸿等,熊十力也有参与。集聚于此,他们形成了以梁漱溟为灵魂的同处共学的师友团队。梁漱溟创办重华书院的入手,是接办曹州中学高中部,在实际学校运转中,曹州中学高中部和重华书院是重叠交织在一处一起开展的。其后曹州因卷入地方军事冲突导致梁漱溟决意离开。此次办学以梁漱溟个人先期退出及师友团队于1925年暑假前全部撤出而告终。复杂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困难,让本是一个书生的梁漱溟感觉世事艰难。

1925年春,梁漱溟师友团队也陆续回到北京,继续他们在曹州中学萌芽的“朝会”同处共学的模式。曹州办学失败后,梁漱溟“犹思别起炉灶于曲阜”。1925年3月29日,梁漱溟在致徐名鸿等人的信中还说:“去年议决本拟在曲阜布置一处数十人用功之所,同人同学有乐意相从者即转移到彼。现在已不作此想。二三年之间无论什么都不作。唯与平叔良庸等觅地自修,养志戡贼。且看结果如何。”^①他们先后在北京什刹海东煤厂和西郊颐和园外东北大有庄租房,师生中除了梁漱溟外,还有熊十力、卫西琴、张俶知、薄蓬山、高赞非、李渊庭、王平叔、云颂天、郝葆光、席朝杰、黄良庸、屠嘉英、吕烈卿、武绍文等。对于这一朋友团体,梁漱溟格外珍惜,倍加看重,以至于梁漱溟认为自己的生活分为两面,一面是家庭,一面就是此朋友团体。这一同处共学的生活方式也成为梁漱溟一生生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梁漱溟追求“心志清明”,向内就是自觉反省,向外就是“亲师求友”。在他聚合之下,“若干青年朋友,形成了一个相勉于人生向上的朋友团体,相互策励终生”^②。梁漱溟极为用心培育的这个团体整合了儒家书院式的讲学活动和佛教朝暮课诵的修行形式,由此既有自律精进,又有群体约束,梁漱溟一派团体道风形成。正是这种类宗教的修行,使得围绕着梁漱溟的学生们,更像信徒一样在岁月变迁中累积崇拜的情感力量,并把这种力量施展在对梁漱溟所树立事业的无比忠诚和毕生追随上。他们的信仰,就是陪伴梁漱溟创造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世界。

梁漱溟师友共同居住,共勉互进,以非常认真虔诚的态度去完成“朝会”,形式是在即将天亮时大家静默团座。这种朝会的团体生活形式,一直被梁漱溟在各种办学的经历中所持续保留,并将这种形式扩大到更广泛的师生团体中。在广州接办省立第一中学,在河南村治学院,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都作为一种正式的学习制度予以实施。在梁漱溟师友团队中,梁漱溟认为“关系最深,踪迹至密,几与毕生相依者,则为王平叔、黄良庸、陈亚三”。黄良庸既是梁的外侄女婿,也是梁的得意门生之一。而黄良庸与王平叔应是梁漱溟师友团队中共事时间最长、思想交流最多、个人情感最深的挚友^③。或许是受了梁漱溟对于文字的重视,他们师友团队之间除了面对面交谈之外,也常常通过师生通信的方式进行哲学思想及社会人生等方面的探讨和交流。1925年4月3日,黄良庸致信梁漱溟,宽慰梁漱溟说:“今日吾等正无力振作之时也,亦一缕生机之时也。吾人在此困苦中,或不知此时之机遇为可爱,焉知他日有寸进,而不以此时为一大关键耶。”他在信中也提出“将一切放下,觅一静地,限以时期,痛下针砭,冀赖天之灵,得一转机,以拯生民于涂炭。”^④至于所选静修之地如何处理家庭与学问关系,黄良庸对于梁漱溟主张“用功不可离开家眷”不以为然,他认为可以采取“不即不离”态度,“将心安放于家事与自身之间,随时致力”,并劝梁漱溟:“在此时期,生不主张多所举动,只将眼前事物略略放开,随分致力,三年以后再作道理。”^⑤正是在此信后,梁漱溟写下批语认为“平叔良庸从游于我,皆胜于我。如此信所以教我者皆不易之道也”^⑥。

① 梁漱溟:《致徐名鸿等》,梁培宽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2页。

② 梁培宽:《创造朋友团体 永念师友情谊》,梁培宽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③ 参考王平叔:《书信2〈致梁漱溟〉》,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6页下注释。

④ 黄良庸:《致梁漱溟》,梁培宽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739-740页。

⑤ 黄良庸:《致梁漱溟》,梁培宽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741页。

⑥ 见黄良庸:《致梁漱溟》,此文文末有梁漱溟批注,批注时间为1976年8月,梁培宽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741页。又见王平叔:《书信2〈致梁漱溟〉》,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6页下注释。

受梁漱溟影响最为深刻者,应该属王平叔。在这一时期,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信中,更多的表达像是忠实信徒向领袖的告白,“彻才质之庸劣实不可讳言(今春以来即常致叹于此矣),然固常欲以师之志为志矣”^①,“只觉有话便想向师说,有一点新的意思便欲为师吐出耳。甚至一日不见师在,则心便彷徨孤露,读书用思,其兴趣都差许多。每见师从外归来,心便欢欣愉快不已”^②,“诚以彻之于师时时有同气之感者,即在志愿之方向与思想之路数相同故耳。此二者实即吾侪性命之所寄托。对己对天下都止有在此力求无歉而已。师若在此上要彻死,彻不敢不死;要彻生,彻亦愿勉力去生(彻写至此悲凄无言矣)”^③。

1926年1月21日,王平叔在写给梁漱溟的信中提出建立一宗教的主张。他认为:西洋之古先哲人“着眼于物,愈走愈远,愈出愈外,卒之为破碎支离之理智所苦乱”^④。中国古先哲人“着眼于人,愈走愈远,愈出愈外,卒之而为干枯无实之人伦所训条缠渍。”^⑤解决这些问题,“还此事于独立超越,究由何道?”王平叔大胆提出“舍建立宗教外末由矣”^⑥。并且,王平叔认为他所说的所谓宗教仅有倏铿“能与之同”“生心目中所欲建立之宗教,盖止专指看守此独立超脱不为一切所援引负堕者言之耳”^⑦,在信末,他又特别指出“此信曾寄良庸,外人不足观。望师置之”^⑧,大概“自知是极不成熟的主张”^⑨。他们的“朝会”之所命名为“广大坚固瑜伽精舍”,单单从此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这一修行方式深受印度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就不难体会出王平叔对于建立一种宗教的主张是深受这一修行氛围的激励而提出的。

“一个精神上的统一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群体中的态度和行为是极富感染力的”^⑩。梁漱溟的这种火热的信念、坚定的态度传染给他们这一刻处于社会边缘的师友团队,经过大家的讨论、重复、支持,这一信念更加强化。这种集体生活下,梁漱溟师友团队的感情和意志逐渐同质化,一种他们所共认的规范内植每个人心中。其后,他们共同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日常生活中就保持了这一团体“特定规范共认”的力量。

梁漱溟是一个行动派。他在静修思考中保持着对时局的关注。1925年,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数次致信梁漱溟与熊十力,邀请南下“共事革命”^⑪。梁漱溟遂派王平叔、黄艮庸、徐名鸿三人先去广州了解南方大局。1927年,王平叔、黄艮庸回到北京汇报南方局势后,梁漱溟受到鼓舞,认为:自己所一向怀疑未能遽然否认的可以否认了,这就是一切的西洋把戏;而一向之有所见未敢遽然自信的可以断然地相信他了,这就是自有立国之道。梁漱溟这个自有立国之道就是他的“乡治”主张。同年5月,梁漱溟抵粤,他期望在政治空气大变的环境中,能够实施他的“乡治”主张。其后在广州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代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接办广州第一中学。这一时期,除了观察波谲云诡的南方政治局势外,主要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他所怀抱的“乡治”思想。体现他的这一主张的,一是他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二是他为伍观淇所领导的全省

① 王平叔:《书信13〈致梁漱溟〉》,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第100页。

② 同上。

③ 王平叔:《书信13〈致梁漱溟〉》,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第101页。

④ 王平叔:《书信15〈致梁漱溟〉》,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第131页。

⑤ 同上。

⑥ 同④。

⑦ 同④。

⑧ 王平叔:《书信15〈致梁漱溟〉》,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第132页。

⑨ 编者页下注释,见王平叔:《书信15〈致梁漱溟〉》,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第128页。这封信并未收入梁培宽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未被收录的原因是不是考虑到“建立宗教”这一说法的敏感性不得而知。

⑩ [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9页。

⑪ 梁漱溟:《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6页。

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的十次连续演讲,三是他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教职员大会上的两次讲话。这些书面材料和演讲、讲话内容标示了他乡治理论的基本成型。

二、开出新组织:乡村建设的改革设计及实施

梁漱溟认为他“所标举的‘乡治’或‘村治’……是一个有特殊意义和整个建国计划的主张,不过要从乡村入手,又归本于乡村。”^①这个特殊意义,即“要在近代都市文明之外,辟造一种乡村文明;其道则在使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②。为何要从乡村入手,又要归本于乡村?谁来辟造乡村文明?如何把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从梁漱溟的本意来看,他当时既反对国民党的“全民革命说”,亦不赞成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说”。不仅如此,他对另外的“各阶级觉悟分子团结革命说”“农工小资产阶级(或小市民)联盟的革命说”“被压迫民众的革命说”“有产者革命说”等也不满意,或者认为是错误的。那么,梁漱溟认为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或者说他思考的“中国问题”的解决路径是什么呢?

1929年2月,梁漱溟自广州北上至各地考察,在他考察昆山安亭乡徐公桥乡村改进事业后,直言不讳地对黄任之、江问渔两位主办者说,徐公桥的做法“站在教育家的立场,秉着教育家的态度,当学堂一样的办”,解决不了农村的“贫”和“陋”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近二十年急剧凋弊”,“产业发达,文化始能增进;若单从教育上文化上作工夫,都不免枉用心力。”^③他更直接说明,他与黄、江诸公不同点在于:“诸位是在现状下尽点心,作些应作的事;而我则要以‘中国’这个大问题,在这里讨个究竟解决。”^④1930年,他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讲演中提出两点:什么是中国问题解决的主动动力?解决的方式是改良还是革命?

按照梁漱溟的分析研究,中国问题发自内部者轻而来自国外者重^⑤,文化上的相形见绌系由自家文化的特殊性与很大缺欠而来,因此不具备改变推动外面世界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虽然这个问题普遍地急于中国人之身,但是看见了解这个问题的只有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最先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感受迫害虐待之多数人亟求解除苦痛是事实,只是这些人没有方向。但他们是社会中潜伏的解决社会问题之一大力量,必为“革命方向的知识分子”所凭借。这一大力量,梁漱溟所指就是乡村间居民。从这个逻辑出发,梁漱溟给出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国问题的解决主动权以及发动和完成在于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的联合^⑥。达到这种“发动”的状态后,再进一步,作真正乡村改进工夫,即文化的推进增高。这是梁漱溟所推想的步骤。

第二个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改良还是革命?梁漱溟认为革命就是秩序的改造。中国问题的解决是从“君主专制政治、个人本位的经济”这一旧秩序根本改造为“民主政治、社会本位的经济”新秩序,因此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是“革命”。

梁漱溟对“中国问题”应当如何解决的核心思想,是理解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础,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才能理解梁漱溟乡村建设孜孜以求的到底是什么。1930年11月16日,《村治》第1卷第11、12期开篇刊登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是梁漱溟执笔,“同人所夙昔讨论者,综取大意”^⑦写成的。文中阐发乡村建设事项归类为三大方面。放在首位的是经济一面。他将经济的建设概括

① 梁漱溟:《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② 梁漱溟:《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下注释。

③ 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883-884页。

④ 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884页。

⑤ 梁漱溟:《中国问题之解决》,《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10页。

⑥ 同上。

⑦ 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22页。

为促兴农业,即谋农业技术(求生产的品质和量数)的改进,谋农业经济(生产费的低省和生产值的优厚)的改进,后者的实施主要是通过信用合作、产业合作的方式方法。第二是政治的一面。梁漱溟提出方向上“借经济一面之合作引入政治一面之自治”。这种“中国自有的政治”是包含“地方自治”在内的。第三是教育或文化的一面。他强调民众教育、小学教育和乡间礼俗的兴革三个具体指向。民众教育,以提高一般民众知能为主旨,特别是要学习丹麦以农民教育为推动力。乡间礼俗和法律是互相辅助的关系,可以以吕氏乡约为参考因革损益,确立好的习俗,可以扶赞建设的进行。

梁漱溟在强调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的同时,还坚持了一个原则。这是从他对昆山徐公桥乡村事业改进、定县翟城村治及平民教育促进会华北试验、山西村政等农村社会改革实践的切身观察而得出的。这个原则是“尊重农民意愿,顺应农民需要,启发农民自觉”。

1929年,梁漱溟参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后,认为平民教育现在介入中国乡村为时过早^①。参观完山西村政后,梁漱溟更是举出农村中七个问题或者说是七个难题,认为没有得到解答,也没有人在这上边用心,更是无人留意。这七个问题分别涉及村长选任、村民生活、办事制度、所需经费、办事程序、如何筹款、财务支出等方面。他对山西村政的批评用了两句话概括:“一面是太过不注意;一面是太过用力气”,结果是“全无引人民自动的好方法,当然要靠上面用力推动他。初时大推大动,小推小动,不推不动;最后怕要推亦不动。”由此引出他“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人民好比豆腐”的著名论断:“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②

1930年7月19日,梁漱溟在《答马儒行君书》中,明确提出官府正当用力之道说:“更在为环境之开拓,使其前面有大路可走,则机杼自活。”^③马儒行的来信描述山西“村本政治”强迫施行几乎成了“村崩政治”,其言“凡事一经官办,无事不坏。吾意官府之为物,纯系机械性,无内在精神”^④。梁漱溟的回答提出的官府正当用力之道是指先从经济上安排辟造农业社会化的机会与趋势,则村治之可能境地与自然必要而形成,“凡事当从环境上机会上着眼;当从旁面用力,无从正面用力者;当从间接上用力,无直接用力者”^⑤。

1930年12月1日出版的《村治》第二卷第一期开篇《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是梁漱溟针对“广东省中山县自治状况”以及延伸到湖南地方自治而谈论地方自治的内容。他直陈“如玩幻术的咄嗟立办”的地方自治,“当局法令计划的立刻办成”都是“莫大的苛政,祸害不堪言”^⑥。他谈到,地方社会自治,使地方社会由散漫而入于组织,是营造实际生活的一种好方法,但果真需要到来,人们自会求之,无须强迫。这一“尊重农民意愿,顺应农民需要,启发农民自觉”的原则始终体现在梁漱溟主导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中。

邹平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第一个实验县。梁漱溟于1931年3月筹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开始着手办理邹平实验县区。为什么要办实验县?为什么又选择邹平作为实验县?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储备人才的时候,即应就一地方试行乡村建设,这有两层用意:第一是训练学生实地操作,第二是为其他各县示范。”同时该地“不甚苦而亦非富庶,不太冲繁而交通又非甚不便者为合适”^⑦。根据《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概览》一书记载,当时的邹平面积是2623平方里,相当于655.6平方公里,人口155768人,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规模都比较小。梁漱溟认

① 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891页。

② 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910页。

③ 梁漱溟:《答马儒行君来书》,《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76页。

④ 马儒行:《马儒行君来书》,《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86-187页。

⑤ 梁漱溟:《答马儒行君来书》,《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76页。

⑥ 梁漱溟:《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50页。

⑦ 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37页。

为邹平比较合适的还有一点就是“邹平这个地方没有大地主,当然有谁家地多一些,谁家地少一些的情况,我们做工作比较好做”^①。

邹平实验从1931年7月开始,到1933年7月为第一个阶段,是乡村建设实验区阶段。1933年7月,邹平被划定为县政建设实验区,此后至抗战时期,为县政建设实验区阶段。

乡村建设实验区工作以“尊重农民意愿,顺应农民需要,启发农民自觉”为原则。梁漱溟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原则的意义:“乡村建设工作必以本地人为主,而我们为客。客要帮主人的忙,须先得主人让他帮忙才行。”^②因此,需要取得与地方人士及一般农民的融洽,让农民不猜疑不排拒,是乡村建设工作的基础。

此项工作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举行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各乡小学教员,计有370人参加。讲习会不仅讨论小学教育的问题,而且讲述乡村建设的意义和方法。讲习会结束后,又成立了同学会。同学会是一个教育传播非常有益的工具,河南村治学院的同学会在学院解散后,为同学及以后的村治事业延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个讲习班以及同学会的成立,乡村建设作为一项新的事物得以向农村社会说明和宣传。第二步,举行农产品展览会。1931年9月间开幕,分为示范性表证展览和比较性普通展览两类,共有两千余件。“开会四天,参观者人数共有四万六千余,占邹平县全县人口四分之一”^③。参观者通过展览,以及研究院内演讲、介绍、游戏、戏曲、播放农业电影、参展奖品奖励等活动,了解了乡村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的积极意义,拉近了同情心,打消了距离感。

此后,借着农产品展览会树立的正面形象和促进农业发展的积极效应,梁漱溟带着师生开始下乡办理乡农学校。成立乡农学校之前,邀请本乡有资望的领袖人物充任校董,然后由校董推出校长。校长不必由校董中推出,但校长的资格是必须识字且立身纯正。校董负责组织召集本地成年农民入校学习,教员是研究院训练部培养出来的学员。按照梁漱溟的想法,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使得乡农学校成为乡人自己发动、自己进行的学校。“论其构成分子是当地领袖、当地农民和乡村运动者,三方面合成。而研究院训练的学生,就成了推动乡村的一个力量。他们的后边,是有组织的乡村运动团体。”^④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的框架内,“于整个的乡村运动进行中,乡农学校占根本重要的地位”^⑤。

乡农学校建立以后,以农村事业为乡校功课,以学校为办事机关。乡村运动者主要以设计和推动者的角色发挥作用。乡校功课一方面开设识字、精神陶冶、珠算和唱歌等课目,一方面根据不同地方问题和当地事业开展比如自卫训练、桑蚕改良、棉业改进、植树造林等农业科技促进和农村合作改进运动。

县政建设实验区的工作包括三大项。第一,地方行政改革实验工作,即旧政的改革,积弊的剔除和新政的举办,包括县政府裁局改科、卫生行政、户籍行政等。第二,地方自治实验工作,即由下级自治至县自治的完成。第三,社会改进实验工作,即产业振兴、经济进展、民智开发、人民生活改善、风俗习惯改善等。这三项工作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协同前进。梁漱溟认定行政改革有待地方自治和社会改进,而地方自治需要依赖社会改进才能有真正起色,县政建设需要从改进农村社会入手,需要利用行政力量推行。县政建设实验区的理想目标是“政”“教”“富”“卫”合一。“政”与“教”即是行政机关教育化和教育机关化。村学代替村公所,乡学代替区公所,县自治机关的系统就是县政府——乡学——村学。“富”即以组织各种合作社和农村金融流通处促进包括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等农业振兴事业。“卫”即自卫,组织民众开展自卫训练。

① 成学炎:《梁漱溟先生谈山东乡村建设》,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页。

② 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工作》,《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04页。

③ 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工作》,《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05页。

④ 同上。

⑤ 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工作》,《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06页。

邹平县实验方案中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是“乡学”“村学”制度,1932年开始在全县实行。县以下取消区、乡、镇各层级的行政机构而代之以村学、乡学制度。梁漱溟亲自编写了《村学乡学须知》,这一“须知”实际上是“村学”“乡学”计划的实施方案,其中贯穿着梁漱溟一贯坚持的“尊重农民意愿,顺应农民需要,启发农民自觉”的原则。梁漱溟特别强调不得以硬性法令规定社会关系,要以柔性习惯形成一种新礼俗。他很明确地指出:“村学与乡学内容隐寓有自治组织之意,至多是自治组织的一种预备,不是正式组织。”^①村学乡学的组织构成上,包含四部分人,即学众、学长、学董、教员(乡学又有辅导员)。以村学为例,全村男女老幼皆为村学的学生,称曰“学众”,这是改进乡村社会解决乡村问题的主力。“教员”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副力,以全村民众为工作对象,要经常组织村民聚会聚谈。这种聚会聚谈既包含乡村领袖之间、领袖与民众也包括乡村领袖、民众与教员的聚合。通过教员吸引撮合、提引问题、商讨办法、鼓舞实行,打动乡人的进取之心,使他们乐生进取,发生公共观念和齐心合作的要求,方才达到效果。“学董会”由本村遴选贤望素孚且有办事能力的三到五人,经县政府聘任之后组成,负责办理村学。学董会推选常务学董(村理事)一人驻会执行会务,办理村学具体事务。常务董事还具体负责接办县政府委办事项,并起到政府乡村间的上下沟通、减少隔阂的作用。学董会推选出该学“学长”。学长主要负责民众道德教育,学长要时常点醒大家向上学好的心理,提振大家向上学好的劲头,培养向上学好的精神,还要以超然的地位,抚爱后生,调和大众,监督并调护理事。学长为全村师表,领导着全村的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是村学乡学中最要紧的一句标语口号。村学是乡学的基础;乡学是村学的上层。乡学即以全乡各村的男、妇、老、幼为其学众;乡学有其“学董”“学长”“学众”和“教员”一如村学,不过其范围既大,学董和教员人数多一些,其人选高一层。这样整个一村俨然像一个学校,整个乡也像是一个更大的学校,这便是所谓“社会学校化”。学众、教员、学董和学长,这四部分人构成村学乡学的全盘组织,四部分人分别起着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四个方面,缺少一个,这全盘的大机器便运转不灵了。梁漱溟对这四个方面所发挥的独立不同的作用,概括为:“学众即立法作用,学董即行政作用,学长即监督作用;教员即推动设计作用。”^②

在实质性的发挥行政作用方面,村学之常务学董即村理事,乡学之常务学董即乡理事是负责人。以邹平实验县十三乡乡学建置为例,“全乡共有57个行政村,村村有村理事。村以下设有间(25家为一间,间以下设邻,每5家为一邻),间有间长,邻有邻长。……乡里设有民众大礼堂,每有大事,全乡民众代表,在此开会议决。另有稽核委员会,由各村村理事兼任委员。乡理事是该会的主任。任务是预算决算全乡每年的经济收支。县里规定乡理事每月一次到县开会,任务是各乡理事对县长述职(汇报工作),同时县里也通报情况,布置工作。”^③

因此,在民众眼里,乡理事实际上就是一乡之最高长官,乡理事的选举也就成为了乡村政治中的平衡各方势力抑或是地方权威由此获得合法地位的程序性事件,尤为一方民众所关注。当时十三乡乡理事就发生了选举事件,选举的结果并不是当时邹平实验县所树立所中意的乡理事候选人,借助当事人王峻明后来的回忆,我们可以品味出当时乡村民选的基调以及梁漱溟“尊重农民意愿”的主导原则。王峻明当时以村长身份参加乡理事选举,得票数占总票数的65%,而被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自己培养的刘书林得票为35%。但选举后却宣布是刘当选,结果引起当地人众怒,不仅砸了票箱,还顺带打了当时正在现场的徐树人县长。梁漱溟后来到十三乡用了三天的时间走访调研。据王峻明回忆:“梁也了解了我在当地的为人,前后共访问了三天。第四天上午才回到乡学驻地,从花沟裕盛德饭庄,订了35桌菜饭(菜饭费用由省研究院经费中开支,不给地方增加负担),召集各村长、教员等近400人,其中也有妇女,还有

①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8年,第83页。

②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新编增订本)》,第106页。

③ 王峻明:《简述邹平实验县第十三乡乡学》,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第219页。

他访问的部分人员,共进晚餐。然后,梁把南乡北乡的人员搭配编组,每组五六人不等,由梁漱溟亲自主持,当晚进行选举。一直选举到夜间12点才结束,结果百分之百的选票投了我。”^①

这一事件的解决在当时对于乡村的自治原则具有积极意义,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梁漱溟“村学”“乡学”组织设计中关于“学长”的作用的局限性。在这起事件中,“学长”并没有也不能起到梁漱溟所设计的监督以“维持礼俗”及维持乡村社会民众认可的社会公正的作用。没有来自政府的授权,以及民众对此授权的接受、认可,学长的这种道德约束如同庙里供奉的菩萨,很难走下神坛有其实施的空间。

在设立村学乡学的条文规定中有“视其力之所及,又事之所宜”两句话。这就表示有很大的伸缩性,而不求其机械整齐划一。这不但为了各村各乡情况不同,不应强求其如何如何,更为了授权其本村本乡乃能诱进于地方自治之路。所以乡学村学的教员和上文所说的乡学辅导员最要紧的任务,是从旁启发大家对公共事业的积极性和帮助各学董和衷共济,使众心翕合,发生团体之作用。只有发生团体作用之时,才算得是地方自治。

从梁漱溟所认识到中国有“团体生活”“科学知识技能”两大缺欠的认识出发,他认为村学乡学的功用就分为两点:“第一是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互联互通‘引进科学技术’,第二民众积极参加团体生活逐渐‘养成团体组织’。”^②第一点,是要通过问题上达、方法下达、内外交通、上下相连的方法达到“生产事业的科学化,乡村生活的科学化”^③;第二点,是要通过团体生活的学习、团体生活的开创来达到发生公共观念、养成公民组织的目标。^④梁漱溟更是用“乡村生长”指代“乡村建设”来强调乡村内生自发的意义。他说:“乡村建设,就是要先从乡村组织做起,从乡村开端倪,渐渐地扩大开展成功为一个大的新的社会制度。”^⑤

经过梁漱溟和研究院、实验区的多方努力,1936年邹平全境设立了乡学14处,全县316村设置学校285处,完全小学1处(实验小学),高级小学部13处(乡学高小部),初级小学271处(包括村学儿童部女子部等),各学校设有成年部272处。1935年,根据农村经济困窘而导致数千小学失学问题,实验区实施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成立“共学处”。到1936年上半年设有共学处472处,原规定各村均须举办共学处,但实际上尚未普遍^⑥。据当时的视导人员观察,有三个原因,一是教员能力较差,无力顾及;二是导友无适当人选;三是乡村人顽固,不让儿童到共学处去^⑦。各个学校在学校设备包括桌椅、取暖、运动器具、算盘等方面都相当短缺,并且在精神层面,社会心理或个人心理,多敷衍了事,取得的成效远没有达到梁漱溟所期待的效果。梁漱溟在1935年10月10日提交的无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的书面报告《一年来的山东工作》中,直言不讳地谈到了缓办村学的情况^⑧。

三、乡村不动: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以事实来说,梁漱溟得以在乡村建设的洪流中脱颖而出,与梁仲华让贤院长这一帮助有着很大关联。更先是王鸿一的推崇使得梁漱溟实现了从学界到社会大舞台的转变。这些终归是外力,梁漱溟自

① 王峻明:《简述邹平实验县第十三乡乡学》,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第218页。

②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新编增订本)》,第56-57页。

③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新编增订本)》,第55页。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新编增订本)》,第126-127页。

⑤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新编增订本)》,第129页。

⑥ 超然、天培:《对邹平教育现状的巡视》,《乡村建设半月刊》1937年第6卷第11期,第1页。

⑦ 同上。

⑧ 梁漱溟:《一年来的山东工作》,《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775页。

身出于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出于对民族文化复兴的光荣使命,出于对给定中国一个出路的坚定意念,使他逐渐在组织团体中自然而然地成为理论的先锋和团队的领袖。

积累十年来的努力,梁漱溟“率领着四千多同事和学生,在山东省邹平菏泽济宁等县,埋头干‘乡村运动’”^①,如此浩荡的队伍在幅员广阔的齐鲁大地从事着乡村建设的实验,在当时,梁漱溟被视为“村治派”当之无愧的首领。

对于团体组织一说,梁漱溟起初并不赞成,且持否认态度。在《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中,梁漱溟说:“吾侪夙被人目为国内政治运动之一派,加以党派名号,如‘村治派’‘农民社会党’之类;即日本报纸杂志书籍亦数数称引,而有‘农村社会主义党’等名词。其实吾侪固始终未曾建立一团体组织。”^②但同样在该书函中,梁漱溟又说:“余自视不足为团体行动之领导者,尝仔细为同人同学分析之;而仲华先生同亦缺乏自信。彼此均非伪谦推让,而卒落于无人敢当。二十五年下半年余及同人合力推戴仲华先生,煞费力气,结果仍不彻底,竟以模糊敷衍终此局。”^③正是因为团体组织没有建立,所以导致其他种种缺欠。这些缺欠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由于无组织而致工作:全部落入无统制无计划之局面;不能收取中层下层同人同学之意见;容易被动,不能自主;不能求至善,而过失亦不能纠察;易于溃散。问谁贻误至此?梁漱溟言:“则上层干部俱不能逃责,而余及仲华先生罪咎最重。”^④

梁漱溟痛感多年工作覆败于一旦,思考团体组织更有建立的必要。对于村治派是什么样一种组织,梁漱溟曾经说:“吾侪团体组织,非普及之学术团体,如‘科学社’‘平教会’之类;亦非通常之政党,如‘共产党’‘国家主义青年党’之比。但吾侪实为包涵政治运动之一种社会运动”。又言“同于中国古人讲学之义,但非止于知识思想之间。——是为从来中国特有之学术团体。吾侪既从事政治活动,何以又非政党。政党必争政权,吾侪不争政权,便非通常之政党。——是为今后中国所特有政治团体。”梁漱溟所倡导的团体组织,是一种有政治活动的学术团体和有研究性的政治团体的融合。在中国,一个组织没有政权却又奢望主导社会改革,梁漱溟不切实际的理想必然会遭到现实直面打击。徐树人作为实验县长,深感实验效果失败痛切,曾总结说:“梁漱溟以为将政治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纳入乡学、村学的师生关系中体现(名曰‘师统政治’),再加上‘伦理情谊为重’,‘互以对方为重’等精神教育,将‘相对之势’转化为‘相与之情’,问题就容易解决,事实上实验结果都行不通。”^⑤

1935年10月25日,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做了一次讲演,他提出两大难处,原拟为两大苦处,后来又改成两大难处。第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他直接指出这是一个矛盾,是社会改造的革命性和依附于政权妥协性的矛盾。旁处的乡村工作,就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在做某一方面的或某一项的改良工作,本来就不说社会改造。第二点,“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是一个事实。无论在无锡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还是在定县开的年会,都可以看出其间乡村农民的代表差不多没有。乡村工作的几个重要标志地点,平教会在定县、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建设工作人员并没有和乡村打成一片,河南镇平内乡一带在这方面做的要强一点。此外还有一点,梁漱溟指出:“乡村运动者,自己不能合为一个力量;各有其来历背景,各有其意见主张。那末,期望它来改造社会又如何能行?因为没有一定的方针要求,就不成功一个大力量。这个问题也很不小。连前两个问题合起来,也可说我们的三大问题。此三大问题排列出来就是:一与政府应分而不分;二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三是彼此也不

① 曹欲仁:《梁漱溟先生的“村治派”》,《血路》1938年第17期。

② 梁漱溟:《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5页。

③ 梁漱溟:《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6页。

④ 梁漱溟:《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28页。

⑤ 徐树人:《我担任邹平实验县县长的前前后后》,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第102-103页。

能合而为一。”^①针对这三项问题,梁漱溟也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需要注意的五点。一是要坚守社会运动的立场,绝对不能自操政权。二是注意保持与政权的一定比例平衡。三是学习丹麦民众教育办法,接受政府津贴不受政府干涉。四是志愿服务乡村建设的团体组织应该相互联合自成系统。五是乡村运动者要有远大的目标。做到上述五点,梁漱溟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以上五点,果然能循守无违,则无论如何不会失掉我们自己,而大局亦必可随之转移过来。这是没有疑问的。难处虽多,危机虽伏,都还不是致命伤;就怕志趣不坚,认题不清,立脚不稳,此外没有怕的。”^②对于梁漱溟当时自己所标举出的三大问题的结论,徐树人直言梁漱溟说的是老实话,但同时认为,对三大问题如何解决,梁漱溟并没有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来^③。

余 论

林耀华比喻平衡是社会的常态时,曾经有过一个享誉国际的“竹竿—橡皮带”比喻。其实,这种平衡的状态,和梁漱溟所比喻的“铁钩—豆腐”理论中的“豆腐”一样。但是梁漱溟不赞成的是政府对于社会的强烈干预,他所主张的是社会团体基于柔性原则对社会的改造。林耀华所强调的这张“竹竿—橡皮带”所构成的网中,竹竿并不是停止不动的,橡皮带也不是永久坚固的。人或者群体受到外力因素,因为橡皮带具备弹性且坚韧的性能,一方面说明这张网会自我调适,不易轻易断裂破碎,但是如果外力冲击猛烈持久,橡皮带不能承受,那么这张网原有的平衡状态就会被打破,所有的竹竿陷入一片混乱,必须经过一定的时空调适,才能形成新的橡皮带,从而把竹竿从纷乱中排列组合重新凝聚为一种新的平衡状态。梁漱溟的两大难处,“依附政权”与“乡村不动”,其实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原有的橡皮带还在工作。第三个难处,亦即第三个问题,“乡村运动者无力量”,就是指他们自身具备的力量没有达到打破原有橡皮带的量级。这个逻辑是从外来者的角度阐述的,恰恰并不符合梁漱溟的启发农民自觉的一贯主张。显而易见,打破这根橡皮带的不仅仅是外力,竹竿发生的自我结构的内部巨变,内生自力,一样可以促使橡皮带发生裂变。梁漱溟一直以来致力的就是这个方向。他多次呼吁的是“最要紧的就是赶快想法子创造一个新文化,好来救护旧农村”^④，“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⑤。

国家政治权力在农村社会的渗透和扩张具有渐进性,既有显性呈现也具有隐蔽性,更多的表现形式是柔性的,是通过农村政治的制度性安排实现的。它与乡村社会延续下来的,也是梁漱溟强调的“伦理理性”的非制度性安排在发展的趋势上是融合,互补的,构成了乡村社会治理和秩序维持的系统性结构安排。梁漱溟所期望的从“中国老道理的真精神里开出一个新局面”还需要放在更长更宽宏的时空长河中留待验证。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76-577页。

② 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84-585页。

③ 参考徐树人:《我担任邹平实验县县长的前前后后》,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第104-105页。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新编增订本)》,第21页。

⑤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新编增订本)》,第20页。